

投稿類別:史地類

篇名

國共命運十五天——西安事變之探討

作者

張鈞傑，新北市立秀峰高級高中，四年八班

指導老師

魏宇漢

國共命運十五天——西安事變之探討

壹●前言

一、研究動機

從小，筆者就聽過西安事變，所以對此產生興趣。但是在課堂上，老師未能深入講述，或告訴我們其中的前因後果。因此，筆者對於西安事變中，國共兩黨的應變方法不甚了解，亦不明白國共兩黨面對此事時的態度，遂以此為研究主題。

二、研究目的

本文旨在探討中國國民黨、中國共產黨的應變方法及看待此事的態度，希冀能深入研究並呈現此一事件的面貌：國民黨方面，將以宋子文、宋美齡、何應欽等人為主；中國共產黨則以周恩來為代表。此外，筆者也期待能藉由這篇文章，呈現出不同於教科書——例如三民版高中歷史課本的敘述。(李福鐘，2017)

三、研究方法

以文獻探討為主，內容有二：回憶錄及二手資料。回憶錄有張學良的口述歷史、蔣中正《西安半月記》等；二手資料則有傅虹霖〈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〉、李立〈親歷西安事變〉等。

貳●正文

一、事件的背景

(一)九一八事變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因為經濟大蕭條而發動九一八事變。張學良在蔣中正的指使下，率領東北軍撤出。事後，張學良因為不抵抗而在輿論壓力下得到「不抵抗將軍」的評語。其後，張學良辭職，並出國考察。

(二)張學良重新回到中國

1933年到1934年中，張學良戒毒、遊歐，身形從過去清瘦而增胖。回到廣州之後，遇見了胡漢民，胡勸張別和蔣中正共同合作。然當時張學良認為只有法西斯能拯救中國，在汪精衛、蔣中正等政治人物中，張學良始終認為全中國只能有一位領袖，而那位領袖就是「蔣中正」。

(三)對日本的仇恨

在 1928 年，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向南京政府求和，然而張作霖卻在乘坐火車返回東北時，於皇姑屯車站遭日軍炸死。其後，少帥「張學良」接管東北，而張為了幫父親報仇，便宣布與蔣中正合作。

(四)剿共

1935 年，蔣中正派張學良圍剿中國共產黨的「中國工農紅軍」，卻遭到挫折——兩個整編師被全殲，此事使張逐漸對蔣的調遣產生反感。1935 年 9 月 20 日蔣中正在西安設立「西北剿匪總司令部」，並讓張學良擔任「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」。而在剿共的同時，日軍侵華日急，「中國共產黨趁機反蔣反日等口號，也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，全國人民希望蔣中正停止內戰實行抗日。」(傅弘霖 2014)

(五)攘外必先安內

攘外必先安內是發生九一八事件前提出的政治內容，在剿共期間，張學良曾經向蔣中正說希望能聯共抗日，但是蔣中正卻認為，剿共應該才是最先要處理的事情，但此時的張學良一心只想抗日，中國共產黨也形容張學良為「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」。

(六)與中國共產黨的接觸

1935 年 11 月 28 日，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救國宣言，而在九一八事件後張學良曾經向東北軍說過：「我一定會帶著你們打回東北老家」，而中共也對外宣傳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」等口號，希望能停止國民黨的剿共，而此時的張學良抗日心態已決，而在 1936 年 9 月，張學良就與中國共產黨簽訂了「抗日共同條約」。(楊奎松 1995)

(七)事件發生前夕

1936 年 12 月 1 日，蔣中正對張學良說明如果不執行剿共命令，將奪走他的兵權，而張學良勸蔣中正改變政策，並且前去抗日，但是蔣中正卻寫信給邵力子，讓他去奪取張學良的兵權。

二、事件爆發

(一)策畫

在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、楊虎城兩位將軍痛感「國權凌夷，疆土日蹙」，於是在 1936 年 12 月 8 日，向蔣中正建議先抗日再剿共。然蔣中正則回以要撤換「不剿共、要抗日」的將領，因此，張學良與楊虎城決定發動兵諫，活捉蔣中正，藉此迫其同意抗日。

(二)決定

1936 年 12 月 9 日，一萬五千名學生以及民眾遊行請願，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。而多數人也決定向蔣中正請願，但蔣中正卻始終認為剿共為主要的事情，而張學良則在當天晚上向蔣中正請願要求，但是蔣中正卻決定拔掉張學良的兵權，「而張學良、楊虎城二人決定在 12 月 12 日清晨對蔣中正發動兵諫，用武力迫使蔣中正同意抗日。」(李立 2007)

(三)發動

1936 年 12 月 12 日零時，張學良向中國共產黨宣布自己的行動後便發動兵諫，而在華清池的蔣中正仍不知此事，兩個小時後，蔣中正跑向樹林躲藏，在凌晨四時被發現且被活捉。

三、事件後雙方的反應

(一)共產黨

1.周恩來

在西安事變中，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人。在張學良、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後，中國共產黨讓周恩來前往西安，代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談判，周恩來向中國國民黨提出的條件如下：1、釋放政治犯；2、把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給趕走；3、開放言論、集會自由；4、停止剿共、共同抗日；5、召開救國會議；6、不分黨派的人加入國民黨。除此之外，另要求國民黨釋放政治犯。此舉讓中國共產黨在日後的國共戰爭中取得優勢。

(二)國民黨

1.宋美齡

宋美齡在西安事變發生後，希望能迅速的解決此事，並保證蔣中正的安全。於是在事件發生後，便立即動身前往西安，營救蔣中正。宋美齡在西安事變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她認為事件應該要和平解決，她不顧自身安危，與大哥宋子文前往西安勸說張學良以大局為重。她明確的告訴張學良：「她力主抗日與和平」。12月24日，與中國共產黨達成協議，接著在12月25日順利地把蔣中正帶回南京。

2.宋子文

在西安事變發生後，宋子文當下決定前往西安幫助蔣中正。宋子文知道張、楊二人是為了抗日而兵諫蔣中正。在抵達西安後，宋子文便前往蔣中正的所在之處遊說他改變政策。「在一見到蔣中正時，宋子文便去安撫蔣中正跟他說：『這並不是他的錯。』」（吳景平 2010）

宋子文與宋美齡二人，無疑是談判人物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，雖然宋子文回到南京後，蔣中正對他的表現不甚滿意，但是他為了讓蔣中正能順利的被張學良等人釋放，仍積極營救。雖然不知道宋子文如何說服蔣中正改變政策，但是冒著生命危險去援救蔣中正的他，是如此的重要。

3.何應欽

何應欽在西安事變後，於國民黨內部發表對宋子文、宋美齡等人不同的看法。他認為西安事變應該使用武力鎮壓，不必管蔣中正的安危。12月16日，南京政府下令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，並在17日對外揚言要轟炸西安。然而在12月24日時，宋美齡與宋子文在西安與中國共產黨達成協議時，其後，何應欽於12月29日被撤銷討逆總司令的職位。

日期	過程
12 月 12 日	西安事件爆發
12 月 17 日	何應欽揚言轟炸西安
12 月 19 日	周恩來前往西安
12 月 20 日	宋子文抵達西安
12 月 21 日	宋子文返回南京
12 月 22 日	宋子文與宋美齡前往西安談判
12 月 24 日	與中共達成協議
12 月 25 日	西安事變結束、蔣中正回到南京

資料來源:筆者整理

(三)雙方反應統整

根據以上所述，周恩來、宋美齡、宋子文等人都希望事件能和平解決，唯有何應欽希望能用武力解決。

筆者以為，中國共產黨派周恩來前往處理，而周恩來本人亦希冀事件能盡速落幕。原因在於他需要蔣中正幫助共產黨抗日，同時希望停止內戰，以便共產黨能休養生息。

宋美齡則希望事件和平落幕的原因，除了蔣中正是她的丈夫外，還希望中國內部不要出現分歧。因為她知道張學良只是希望抗日，並不是背叛蔣中正。

宋子文希望和平結束的原因，則是因為他覺得如果中國出現內亂，日本將會繼續侵略中國。

至於何應欽，除了想以武力鎮壓西安事變外，他認為現在的中國不應該抗日，而是要選擇與日本合作。他認為中國應該親日，在西安事變的時候，他不顧蔣中正的安危，選擇要轟炸西安。在西安事變結束後他的權力也慢慢地消失。

四、後續的影響

(一)中國共產黨的影響

西安事變的發生，可以說是對中國共產黨最想看到的結果。因為這件事對中國共產黨來說，既能消耗國民政府，又能發展自身實力。雖然在國民政府的「剿共」、「兩萬五千里長征」中消耗了大部分戰力，但是西安事變完完全全的把共產黨從潰滅邊緣救了回來。

(二)中國國民黨的影響

雖然在當時日本的侵略中，蔣中正依然認為剿共為第一優先，而提出的「攘外安內」政策，但是已經與當時國內的民心不符了。當時大部分的中國人認為應該要使用中國共產黨的「聯合抗日」。蔣中正說過：「他做的事情是對的」(唐德剛，2009)，但是他的個性造就了西安事變的發生，使他不得不把矛頭轉向日本，影響日後對共產黨的戰爭局勢。

參●結論

西安事變是影響深遠的事件，這件事拯救了中國共產黨，促使中國共產黨在日後的壯大，並於日後的國共戰爭中取得勝利。歷史影響我們許多，但是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是相輔相成的，「假如沒有西安事變，剿共的政策堅持到底是不是現在的中國就是中國國民黨的，是不是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了？」(唐德剛 2009)這些事情沒有任何人能夠確定，「剿共完後的中國是否會被日本給侵略，是否會改變整個中國甚至於世界的歷史」(唐德剛 2009)，我們現在不能去評論當時任何人的是非功過，他們都是時代下的行動者，每個人都有其個人意志來行動，我們只能用歷史來看當初的事件，了解之、熟悉之，並盡量從不同的視角看待歷史，進而接近這個事件的全貌，就好像是「歐洲的希特勒在當時的德國是惡魔嗎？」筆者在這份研究中，了解到任何事情，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觀點，不能只用特定的角度看待整件事，而是要了解各個人物的觀點，再深入探討。

肆●引註資料

吳景平(2010)。宋子文生平與資料文獻研究。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

李立(2007)。親歷西安事變。北京：團結出版社

李福鐘(2017)。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三冊。臺北：三民書局

唐德剛(2009)。張學良口述歷史。臺北市：遠流出版社

傅虹霖(2014)。張學良與西安事變。香港：中華出版

楊奎松(1995)西安事變新探。台灣:三民出版

蔣中正(1993)。西安半月記。台南市:中央文物出版

林桶法(1998)。評馬齊彬編《國共兩黨關係史》。國史館館刊，25，303－314。

劉維開(2009)。對日備戰與中蘇談判(1931-1937)。臺大歷史學報，第43期，87－149。